

对话
语文



对话语文

主持人：福州一中特级教师 陈日亮

地点：厦门

时间：2004年12月18日

背景：孙绍振语文教学思想研讨会开幕式

陈日亮（以下简称“陈”）：现在这里要举行一个高端的座谈会，坐在我旁边的两位都是著名的学者，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位是福建师大的孙绍振教授，一位是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在开始高端对话之前，我想用一点时间简单地对他们俩做一些介绍。

关于孙老师的介绍已经非常多了，但是我在这里还是想重复一下。可能很多老师都只知道孙老师是一个炮手，在上个世纪末，他号召炮轰全国统一高考体制，并批判全国高考语文试卷。有的人说他是破坏者，实际他更是一个建设者，大家看到这本《直谏中学语文教学》，会对孙老师充满信心。他不仅是炮轰，而且还动手建设，他提出了文本分析的一套完整的新方法：还原和比较，还原中还有艺术感

觉的还原和关键词语的还原，以下分为不同艺术形式、不同历史时代、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还原和比较等等，所以他当然就成为我们闽派语文的一名语文教学建设的旗手。

另一位就是钱理群教授。他是中国现代文学著名的研究专家，是研究鲁迅的学者，但是，钱老师多次强调，首先应该把他看成是一位教师，而不是一位学者。他跟中学的语文教师、跟中学生建立了广泛而亲切的联系，把这几年来所写的大量的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研究的文章、随笔、书信，汇编成一本《语文教育门外谈》。实际上，钱老师在更早，大约在 10 年前，就在《语文学习》上开了个专栏，叫做《名作重读》。这本书当时确实是别开生面，让许多语文界的同行们感到耳目一新。钱老师不是站在门外，即使他站在门外说的也是内行话。他现在从门外进入了门内，回到了他的母校南京师大附中，上了 40 天的课，就是《鲁迅作品选读》。钱先生曾经在中等学校教过 18 年的书，在贵州一个偏远的县，一所中专学校。他说他从初一教到高三。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在中专怎么可能从初一教到高三呢？因为他的学生都是些基层卫生人员，只有小学毕业程度，他必须从初一教起。钱老师说他跟中学语文教学有一种不解之缘，他为自己的中学语文教员出身而感到自豪。钱老师令我们感兴趣，不仅因为有这样一段教学的生涯，而且还因为，他在念小学的时候，就梦想着要当一名老师。是在小学六年级吧，事实上，他那时就当过老师了，在“小先生学校”里面当了老师，还当了“校长”。这段经历肯定是鲜为人知的，大家一定要看 2004 年《语文学习》第六期，其中有他的一篇文章《我的教师梦》，翻一翻就知道了。他和语文教学有不解之缘，他有深入骨髓的教师情结，他生来就是一个当教师的料。

我们请钱老师和孙老师对话，这是非常难得的。在我的印象中，目前高校教授、学者、著名的理论家介入了中学语文教学，好像在全国，他们两位最为突出，也最为执著，呼喊的声音最响亮，可以称为“北钱南孙”。现在，我们就开始钱孙高端对话。

我想先问一下钱老师，你这次接受福建中学语文学会的邀请到厦门来，参加这样一个盛会，怀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感想？

钱理群（以下简称“钱”）：我是 2002 年 8 月退休的。退休之后，我给自己订了两条，一条是“想大问题做小事情”，一条是“多做事少开会”，所以我总是尽可能地不出席各种会议，但是我这次还是来了，而且是非常高兴地来了。为什么高兴？一方面孙绍振老师是我的学长，我们是北大的，他是五五级的，我是五六级的，他是我的学长，学长有命，学弟就必须服从，这是中国的传统，所以我就来了。另一方面，我是怀着很深的忧虑来的，这一点我和孙老师不太一样，孙老师比我乐观，我可能太受鲁迅影响，什么事都忧心忡忡，有很大的焦虑，我这次是来寻求精神支援的。我觉得现在的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刻。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起鲁迅来，他曾经说过，中国的改革常常遇到三种情况，我理解就是“三部曲”。刚开始提出改革的时候，你会受到权力的压制和习惯势力的抵制，所以非常困难，可以说是举步维艰。到压不住的时候，权势就纷纷改变态度与策略，变成支持改革了。突然之间，改革就成为了一种潮流，成为了一种时尚。改革的旗帜插过去，插过去，插遍全中国。但在鲁迅看来，这时候恰恰就孕育着危机了。我理解的鲁迅讲的这个危机，就是指一种理念与倡导，改革一旦成为时髦，变成一个时尚的品牌的的时候，就可能会变形、变质，在潮流之下，就必然会产生许多新问题，甚至会发生某种混乱。在这种变形、变质、混乱的情况下，你自身又会出现许多问题。因为改革就是实验，实验不可能每步都考虑得这么周到，必然会有些问题，产生你意想不到的弊端。这时候可能会出现第三步曲折，就是会有人打着“纠偏”的旗号来反攻倒算，走回头路。鲁迅先生用一句很形象的话说，叫做“改革一两，反动十斤”，那个是很可怕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第一步大概已经走过来了，改革已经成为潮流了，全中国大概没有一个人会说我反对改革，而且都自称是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支持者。但是，在这热闹之中我们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甚至发生了某种混乱，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些问题，搞不好就会出大问题。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着当改革成为时髦的时候，我们怎样坚持自己心目中的改革的问题。不追这个时髦，如何坚持改革，如何坚持实验，同时又如何面对我们已经产生的

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当下非常急迫的任务。正像刚才我所说的，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很可能带来我们想象不到的后果。为这个事，我在北京整天焦虑不安。（笑）因此，一听到福建要讨论，我就觉得我是可以来寻找精神支援的，就是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如何坚持改革，如何坚持实验，又如何面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我是带这样一个问题来参加这个会的。

陈：钱老师刚才讲得非常好，他所提的不是在出现问题以后才想到，其实他在很早就想到了。我这里想引用钱老师说过的一句话，好多年以前，当有人去拜访他时，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认为最担心的有两点，第一点是轰轰烈烈地走过场，不着手去解决改革中实际存在的问题，而热衷于搞形式主义，把改革变成一场表演。第二是走极端，要么不改，能不改则不改，要么脑子一热，就乱改一气，不顾客观条件，用行政命令强制改革。”这是钱老师的话。他说的这个忧虑我觉得可能是在场很多老师们共同的。

那么下面我想请孙老师说一说。前不久，在一个会上，我们本来想多请几位老前辈来参加这个会议，听听他们的意见。后来听说有几位不能来了，钱老师能来，孙老师说了一句话：“钱理群一个人够了。”孙老师你好像对钱先生情有独钟，是吧？

孙绍振（以下简称“孙”）：（笑）有这么回事。有的人，我们请他来是由于他的职位，是由于他所掌握的某种权力，不是由于他特别高超的水准，我们不指望他把会议的影响真正地扩大。另外一种人，他可能是没有一点权势，仅仅凭他的水准和操守，像钱老师这样——他是个退休者，但是，他的思想的深度和他的睿智，他对当前改革形势的洞察，能把我们这次会议的整个思想水平提高，甚至于在战略方向上做一个确定。我们当前改革搞了这么多年了，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非常辉煌，但产生的问题也是数不胜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把这个会开成一个不是盲目赞扬、盲目乐观的会，而是非常冷峻地正视问题，实事求是地来总结这段改革的经验，然后揭露错误，挑战面临的问题。事前，我考虑，请钱先生来的话，我们有共同语言。刚才讲到他是一个受到鲁迅的影响非常深的人，对鲁迅有深邃的洞察。鲁迅

的怀疑主义，鲁迅对改革产生流产的预感影响着他，在这一点上，我和他有同感，但是没有他那么深。我这人比较单纯，可能有点浪漫，我认为不管潮流多么反动，生活都是要前进的，改革都是最后要取得胜利的。不管你掌握多大的权力，不管你有多大的影响、多么神气活现，如果你违背了我们母语教育、语文教育、人文教育、语言教育的规律，你的权威迟早都会被历史潮流所粉碎。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历史车轮岂能倒退。历史是非常有趣的，一翻历史就可以看清楚，一些人是如何奋斗的，一些人是如何拙劣地表演的。这么多中学老师辛辛苦苦劳动，这么多家长、学生、研究学者期待着我们语文教学水平的提高，这是最伟大的力量，谁也挡不住的。我很坚定，是相信历史和群众的，鲁迅当年可能对群众的力量估计不是太足。我大胆地说，这可能是鲁迅的缺点，那当然不是说是我的优点。（听众笑）

陈：刚才两位老师已对我们今天的论题做了很好的铺垫，下面我们说说这次大会的主题。大家知道，我们这次大会既是对孙老师语文教学思想进行研讨，同时也是福建八闽语文的一个开坛、一个立派。在开坛、立派的时候，孙老师为我们闽派语文拟了大会标语，一个是“求实”，一个是“去蔽”，一个是“创新”，一个是“兼容”。现在我想先请孙老师说说他如何理解我们闽派语文的这八个大字，请孙老师说一下。

孙：这其实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好多人说话又写文章，最后是我们几个人一起总结出来的。特别是“去蔽”，我虽然说过，但是没有放在纲领性的地位上，后来是陈日亮先生，他说这个很重要，要放进去。“求实”和“去蔽”可以分开逐一加以解说，但实际上，要结合起来讲。改革前的传统语文教学，最大的问题是，把语文搞得像政治课，或者是道德修养课，不太像是语文课。就算是政治课和道德修养课也比较陈旧，跟改革开放的形势不相合拍。但是由于在课本、教参上它仍然存在，老师和同学就不能不跟着它转，时间长了，就产生自我蒙蔽，觉得这一套天经地义，不言而喻，别无选择。改革前的课本，陈旧得令人难以忍受。要“求实”，求语文课之实，求政治课、

道德课之实，就不能不把自己从习惯和现状的蒙蔽中解放出来。还原语文、政治、道德课的本来面貌，把蒙在它们上面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灰尘扫除。所以说“求实”跟“去蔽”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个“蔽”积累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就不知其蔽了，就跟自己的本钱一样了，觉得离开了它，就没有办法开口说话了。这在理论上，有人把它叫做“失语”。用英语来说，就是 aphasia。这本是一种生理上的毛病，就是说不出话来了。用这个症候，来比喻一种现象：除了积重难返的套话，实事求是的话一句也讲不出来。套话是蒙蔽人的，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很现成，不动脑筋，不用力气就能讲一大套。一些老师，包括我们自己，把这些现成话，说来说去，说得没有了自己的感觉。本来接受起来是很困难的，是违反自己的感觉、自己的良知的，但是，说多了不知不觉就成了自己的话了。这时要他再说自己的话他就觉得很痛苦，很有一点抵触。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要“去蔽”呢？因为它是一种心灵的解放、心灵的自由、个性的发扬、想象的放飞，不去蔽，就是自我约束。

本来语文是非常有趣的。这个语文世界，尤其是文学作品，是超越了实用价值观念的自由的心灵境界。语言到了这个领域是非常神妙、非常动人的。我们小时候看小说看得都不想吃饭了，可是为什么到了语文课上，学生们得忍受精神的窒息？这里一定出了什么问题。明明是很精彩的课文，你不去看那些教参还好，一看，都是些干巴巴的、叫人哭笑不得的玩意儿。把这些叫人哭笑不得的东西系统化地扫除，这就是“去蔽”。“去蔽”的关键是要知“蔽”；然后，才能实事求是地进入语文境界。学了语文，你对人、对人生、对自我、对人的理解、对人的同情、对人的心灵有没有新的感悟？对我们的语言，对汉语——我们的母语有没有新的想法？对一些精彩的词语你有没有特别的发现？你的书面表达和口头表达，你的交际能力和交往能力有没有提高？你讲出话来是让人感到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呢，还是让人感到妙语连珠、引人入胜？这是最关键的。如果你学了语文，反而讨厌它了，你讲话反倒更干巴了，你的思想和情感变得很单调、贫乏了，这就说明，你的语文和心灵一直受到了蒙蔽。你就得重新考虑，要不

要对它来一番清理。所以“求实”必须“去蔽”。一切把我们纳入教条的东西，哪怕是神圣的、非常权威的、非常流行的、不言而喻的、显而易见的、天经地义的东西，都要重新反思。不管是他人的，还是自己的，不管是流行的，还是权威的，都要思考，都加以分析，凡是有“蔽”的都必须去除，要非常彻底地“去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创新”。

我们追求“创新”的时候，“去蔽”就是我们的旗帜，但是我们并不排斥其他的、非闽派语文的一些观念，包括一些传统的做法；只要行之有效，我们就要向它学习。孔夫子的思想是几千年前的，其中有许多观念，作为当代人，我们不可能都同意，但是，我们要分析，要学习其中的精华。当代人思想和做法和我们的距离更近，可以学习的东西不会太少，我们没有必要因为它不是自己喜欢的，就去排斥它。它有好东西，就值得我们学习。否则就是“去蔽”的反面，叫做“自蔽”。对现在来讲，关键的就是“去蔽”，“去蔽”的核心之一，就是“去除自我蒙蔽”。英国哲学家罗素有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如何防止自我蒙蔽》。有了防止自我蒙蔽的精神，才能“创新”，才能“求实”。有了“创新”，不能忘记不断“去蔽”，时时刻刻要防止自我蒙蔽，防止自我封锁，那就要谦虚，要谨慎，特别要有自知之明。向其他学派学习，是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法则。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看不得不同的理念，一看就来气。有些年轻人，对钱梦龙先生“教师为主导”的理念，就受不了。我以为，钱先生的思想中有好多宝贵的东西，是历史赋予的，不是偶然的，是一个时代的代表。我们应该向它虚心学习，把它作为历史的台阶，有助于我们更上一层楼。不善于学习，拒绝向不同流派学习，拒绝向你反对的理念学习，就是自我蒙蔽的一种。这不能怪天，不能怪地，只能怪自己。蒙蔽是自己造成的。钱理群先生是专门研究鲁迅的，我们有共同语言。鲁迅的作品里面多少人在自我蒙蔽，像阿 Q 和祥林嫂都死了许多年了，但是阿 Q 式的自我蒙蔽，祥林嫂式的自我麻醉，仍然活着，不在别的什么地方，就在我们自己的心里、自己的口头上。我的意思是，我们在语文的教学过程当中，有时会不知不觉地把阿 Q 的、祥林嫂的自我

蒙蔽用种种现代化的包装加以推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和钱先生一样，有时也是有一点忧郁的。有时候，真是气人哪！不过我不像他那么悲观就是了，我喜欢笑，当然不是傻乎乎地笑，而是意味深长地笑，鬼鬼地笑，坏坏地笑，笑总比哭好嘛。（听众大笑）

陈：孙老师讲的“去蔽”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想到这两个字，我也感觉到现在语文教学里面各种各样的遮蔽、各种各样的壁垒是非常多的。本来准备就这个问题开课的，还没有写好，起了一个稿，题目就叫做“去蔽：语文课改必须承受之重”。关于这一点，钱老师也曾经说过，中国的教育，特别是中小学语文教育，有个重大的失误，就是把原本有无限趣味的课本，变得枯燥乏味，令人厌恶，甚至害怕。我们现在想知道钱老师对闽派语文这八个字有什么样的看法。

钱：我想讲两个方面的问题。我这次来之前突击当了几天学生，拜读了孙绍振先生的著作《直谏中学语文教学》，读了王立根先生的《智慧作文》，还读了张文质先生编的《名师教育论谈》。我在考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闽派语文”，提出要讨论孙绍振先生的教育思想，这里的内在动力，恐怕是一个学科基本建设的问题、中国语文课程教育理论体系的建设问题。

在这样一个命题下面，我觉得有几点，或许就是孙绍振先生教育思想的核心问题。一个就是强调要建立中国自己的语文教育思想，或者是中国的汉语教育理念。这些年来我们很广泛地吸收了西方的各种教育理论。实践证明对我们今天的改革是有好处的，是起促进作用的，但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就是西方的东西和我们的实际，并不完全是合拍的。怎么样和我们中国自己的传统和现实结合起来，创造出我们自己汉语教育的一种理论体系，这是我们面临的新的问题和挑战。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要强调中学语文教育本身就是一门科学，它还有许多分支，如“中学阅读教育学”、“中学作文学”、“中学口语教育学”等等。这个问题讲起来是一个常识，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被普遍地接受。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或者口头上赞同，实际上却不承认：语文教育是一门科学，语文教师是一个专家，是一个专业的工作者，要有

专门的修养。好像谁都可以当语文老师，谁都可以来编教材，别的学科要专家才行，在中学语文界，却不同，什么人都行。这实际上反映了人们不把语文教育当成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刚才王立根老师的开幕词中有几句话我很赞成，他说要使语文教育科学化、本土化、民族化；这三化大概就是孙绍振先生教育思想的一个核心。怎么建立一个民族化、本土化，又是科学化的中学语文教育体系，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既然是一门科学，就应该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这些年，我们比较强调这些东西，有很大的突破，《语文课程标准》大概就体现了这样一个突破。但是我现在还要讲一点，就是要有自己学科的知识体系，在有了基本的教育理念以后，建立汉语教育学科的知识体系。这些年我们好像有点回避谈知识，其实问题不在于过去知识讲多了，而在于我们过去知识本身有问题。比如说语法，我们就把语法家的语法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学语文教育上来，这样的知识本身就有问题。另外就是知识本身它所处的位置，怎么讲知识，知识能不能代替一切，一味地讲知识体系本身的完整性、系统性，变成知识为中心，严重忽视学生语文能力的训练与提高、人文精神的熏陶，等等，这些问题在理解与实践上出了差错。但不是说，不应该有知识，因为我们的教育对象是还处在学习阶段的学生，对他们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的训练，就需要有一定的知识作为支撑。问题是要有什么样的知识——这就有一个知识更新的问题，以及怎样讲知识，如何将有关学科的知识转化为适合中学语文教育特点的知识，建立本学科的知识体系的问题。

孙：钱先生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也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出发点。我们老吵什么知识不知识的，实际上在空对空。因为没有把真知识和落伍的伪知识进行起码的区分。这在文学和语言两方面都很严重。以语言为例，有些老师，常常抱怨，现在课堂上一讲知识，就有压力。当然这是不正常的。但是，我们的老师也应该反思一下，你讲知识是不是可靠。比如，你花了很多精力的语法知识，是不是很可靠，有没有自我蒙蔽的地方？从微观来说，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主

谓宾，定状补，对学生作文讲话有多少好处？是不是存在一些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坏处的可能？从宏观理论来说，你讲的语法，它是不是在学科上已经陈旧了？你没有考虑过，花那么多时间，讲一些陈旧的东西，是不是自讨苦吃？据我所知，现在中学中里流行的语法，其理论基础，最好的，大抵是德·索绪尔的。但是，这种理论是有历史局限性的。它的最大局限性就是把一切语文现象都归纳成一套又一套的语法结构模式，或者叫做规律，不管是精彩的，还是枯燥的语言，都可能是符合语法结构的。所以这种理论体系后来就被另一些语言学理论所补充、修正了。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误的话，那就是语义学、语用学。一个词语并不是只有词典上那种单调的意义，它是随着语境和当事人的情感关系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的，可以说是千变万化，出神入化。我们讲的字、词、句，就其本质而言，往往局限于德·索绪尔那一套。结果把活生生的语言讲成了僵死的条条框框。

文学理论的知识也同样有个知识更新的问题。有些教参编者，至今仍然只懂得一点反映论，而且是机械的反映论的粗浅知识，连辩证法的起码知识都很欠缺，更谈不上活学活用。他们对于这 20 多年来，我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所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没有多少感觉。他们所熟悉的、能够自圆其说的一套，在文学理论界，其局限性早已人所共知。而教参作者却守着它作为看家本领、衣食父母。在学科理念基础还处于这种杂乱无章的状态下，有什么条件谈论学科体系的建设呢？

钱：中学语文教育真要深入下去的话，恐怕要再着力于我们这个学科本身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建设：包括观念，包括知识体系，也包括它的方法论，等等。这大概是我们下一步应该共同努力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加强中学语文教学学的科学研究。记得我在刚介入中学语文教育时，就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在我看来，加强语文教育理论的研究，是能否建立起本民族语文教育的科学体系的一个前提性条件，在一定意义上，这是语文教育改革能否健康、持续、深入地进行下去的一个关键，而这方面又恰恰是一个薄弱环节。”（《语文教育门外谈·一点感想》）应该看到，我们的语文教育改革是在理

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上阵的，这有些无奈，我们只能边改革边建设，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先天的弱点，如果不正视，并加以认真解决，就会出问题。前一个时期，我们主要着手的是解决教育理念陈旧，进行新的教育理念的建设问题，新的课程标准就集中体现了这方面的成果，当然，这些新的理念还有待实践的检验，也会有某些调整，但大体上已经确定下来了。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知识陈旧，建立新的知识体系的问题。如孙先生刚才所说，对当代文学研究与文艺理论研究的突破与成就的隔膜，就尖锐地提出了中学语文学科需要知识更新的问题。这当然不是说，要将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直接搬到中学语文教育中，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教训的；关键是要根据中学语文教育的特殊性质与教学实际，进行科学的转换与创造。这就需要打破大学与中学，教育界与思想文化界相互隔绝的状态，提倡多学科的合作。在我看来，孙绍振先生的工作正是在这方面起了一个带头作用。他所倡导的“还原、比较的文本分析法”，就是将他自己以及文艺理论界的研究成果运用于中学语文教育中的一个尝试，其所提供的有关新的知识、新的分析方法就是在为“中学阅读学”的知识体系、方法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新的基石。建立体系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体系的建设却需要一块一块的基石逐渐积累起来。我们不妨进行这样的设想：能不能集中一批关注中学语文教育的有关学科（如语言学、写作学、文艺理论）专家，和中学语文教育专家、中学语文老师一起，来做这样的知识转换、创造与教学实验，这就有可能对语文教育改革有一个新的推动——也许这又是我一个理想主义的空想，但确实是孙先生的实践给我的启示。

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强调第一线教师的作用。这些年比较强调学生主体，这是正确的，是针对过去的弊病提出的。但是我们多多少少或者忽略了教师的作用，或者对教师的作用与学生的主体性发生了一些误解。这其实也是教育学中的一个课题，也许在这次会上可以做一个讨论：在教学当中，教师和学生，是怎样一个关系。当然，我要说的是，中国的改革发展到现在，它的关键在第一线教师。大政方针，大的目标、原则，课程标准都已经定下了。

现在问题是要真正变成现实，那就取决于第一线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素质。因此，现在第一线教师的状况，特别值得注意。广东一个教师给我写信说，现在第一线教师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还没有话语权。就是说，第一线教师要解决生存权，还有他们的话语权力的问题。生存权的问题和话语权的匮乏，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怎么样把第一线教师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更重要的是，第一线教师迫切需要具体的帮助。孙绍振先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他的理论是具有可操作性的，是可以解决具体的实际的教学问题的，不像我更偏重于理念，具有太浓厚的理想色彩。但我仍然是关注教学的实际状况的，我跟很多第一线老师通气，反复讲一点：教育改革的成败，取决于第一线的教师。而我们这些大学教授，实际上做的是服务性的工作。不过孙绍振老师可能比我服务得更好，更到位。

孙：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改革的成败，取决于第一线老师。钱先生刚才提出的生存权等问题，各个地区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一下子，我们很难充分解决。但是，这不是说，在解决生存状态、物质条件方面的问题以前，我们就只能无所作为。我们一方面解决生存的物质条件，一方面在理论上，要进行一些迫在眉睫的澄清。比如说，刚才钱先生提出，现在学生的主体性是得到了强调了，教师的主体性、话语权却失去了。学生主体性的哲学基础是主体性哲学。按理说，一切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主体性，可是，我们的理论却在千方百计地回避教师的主体性。这可真是一大怪事。为了纠正过去过分强调的教师的主导性，居然，把教师的主体完全抛弃了。这不但在哲学上是讲不通的，而且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应该勇敢一些，将主体性加以分析，学有学的主体，教有教的主体。不过教的主体和学的主体之间的关系要弄清楚。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的教改的理论基础并不是充分理想的，至少没有考虑到当代主体性哲学的发展，例如，主体性哲学向主体间性哲学的发展。我们在教学理念上，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的主体性必然导致另一方面的主体性窒息。从学科理论来说，就是忽略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过去长期压抑学生主体性，现在向另一个极端发展，完全藐视教师主体性。

为什么这样明显的偏颇，这么多聪明人，视而不见？就是因为对洋权威的迷信。因为新的课程标准是从欧洲引进的，在许多人的眼中看来，欧洲就是一个整体，也就是世界上最新的潮流。其实欧洲的教育理念和美洲的教育理念有不尽相同的传统，就是欧洲本身，也不是统一的。至少有四种不同的模式：一、斯堪的那维亚模式（北欧式），二、日耳曼模式（德式），三、拉丁式（法式），四、盎格鲁·萨克逊式（英式）。我们新课程标准主要学的是北欧式的。这种模式非常强调把学生的主体性放在第一位。而法国则比较强调教师的严格管理和系统考试。一个瑞典学生到了法国中学，她这样说：在瑞典课堂上，师生关系很亲密，上课时，教师让学生自己做事，想做怎么做就怎么做。而在法国，师生关系疏远，上课时间完全由教师支配，课堂上讨论很少，发言的机会也不多。学生在课堂有压力，是正常的。这多多少少有点教师主体为主导的味道。但是，由于这几年的片面宣传和推广，给我们许多教师造成了一种印象，好像西方义务教育都是学生主体性一统天下。其实，就是在西方，也是流派纷纭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着重推行的主体性教学理念，一无是处，天下只能是主体间性的天下。我希望看到主体性和主体间性，作为不同的教育学派进行竞争。

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你既然承认语文教育它是一门科学，是一个学科，那么它自然会产生学派的问题。你不觉得它是科学，就没有学派的问题。除了刚刚说的民族化、本土化、科学化之外，它还有一个个性化。这可能又是我的一个浪漫主义的设想：每一个语文老师，应该给语文教学课打上自己的烙印。记得在中学的时候，我们几个语文老师都是有个性的——因为那是一个重点中学，有一流的语文老师。老师的个人修养都各有特点，对各个班级的学生就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你是某某老师这个班级的学生，就有这个班级特殊的气质。比如说我们有个老师，特别喜欢语法，可以称得上是语法专家，我是他那班的学生，我们的语法知识就比别班同学要强。另外一个班的老师特别喜欢古典文学，他教出来的学生就多少有点古典味。我的高三老师喜欢新文学，我身上的五四味就与他有关。就是说，实际上好的

语文老师，总会在自己的教学中打上个人的烙印。这是从个人来说。那么从地方来说，那就有一个闽派，或是浙派，或者是苏派，这样一些问题。但据我所知，像你们这样鲜明地打出“闽派”的旗号，这恐怕在全国是第一份儿。应该说有些省在教育方面做了很多实验的工作，做得很好，但是，它们没有这样的魄力。在我看来，“创立学派”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真正把中学语文教育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当作科学，这才会提出建立学派的历史任务。

具体到闽派的八个字，我也非常同意孙先生刚才说的，这八个字里的关键是“去蔽”。这个“去蔽”，我想做两个层面的解说。一个层面，是根本性的教育目的的“去蔽”。就是我们的教育怎么样能让学生直面自我的心灵，直面自我的生命，真正做到“立人”。我很同意张文质先生他们提倡的“生命化教育”。教育的本质是提升人的生命的，把人的内在的一些美好的东西，把学生内在的生命体验、美好的情思挖掘出来，提升起来。就是善于直面自我、直面自己的生命，要“去蔽”，就是要去把人培养成驯服工具的教学理念与体制之蔽。另外，具体到我们语文教育，具体到过去或者当下弊病来说，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直面文本，直面文本语言。只有直面文本才能直面生命，直面自我。而我们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文本被遮蔽了。我们批评过去的应试教育有很多问题，实际上就是孙先生说的，“知识一大堆，文本不着边”，这是一种遮蔽，而我们现在有另一种形态的遮蔽。我们有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形式主义的东西，说难听点，就是各种各样的“表演”。恰好这种“表演”使学生不能直面文本。昨天晚上聊天时，我听说现在很多学生，你一篇文章讲完了，他还没有完整地读过一遍，我吓了一大跳。（笑）如果学生不阅读文本，不把文本读通，这个老师恐怕是基本失职。怎么样直面文本？“去蔽”！让学生直面文本。而文本的核心在我看来是语言。我们当然可以具体讨论，是哪些东西具体妨碍到我们不能去直面这个文本，直面这个语言。所以，我理解的所谓“去蔽”，就是为了直面文本，直面语文，直面人的心灵，直面人的生命。

陈：钱老师刚才讲的这几个“直面”，非常深刻。那么老师们听

了这些，可能很快就会联系到我们自己。我这几年也经常去听课，听完课后有一点感觉：老师没有备课。可是，实际上呢，他备了。但是他没有在文本上钻研，没有细读文本。所以直面文本也就是回归到基础，最根本的，也就是要备好你的课。过去我们叫“吃透两头”，一头是学生，一头就是教材。但是这样的话现在对年轻老师来说都显得非常的陌生。所以我觉得钱老师讲的这个非常好。孙老师这几年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就是文本解读，而且是经典文本解读。而这经典文本解读，不是零零星星的，而是有一整套的系统的方法。大家看一下《直谏中学语文教学》这本书。那么我们很想来听听孙老师对文本解读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见解。

孙：我还是要补充一下钱先生的意见。当前语文教学改革，有脱离文本的倾向。不但脱离文本，而且脱离“人本”。当然这种倾向，好多不是由我们第一线老师搞出来的，是由外来的行政力量强加的，甚至由行政官员搞出来的。实际上我们在一起交谈的时候，有些教育管理方面的官员，把学生在课堂上发言什么的，对话要多少次，作为评估的标准，这是太可恶了，太不能忍受了，这简直有教育的专制主义的嫌疑。

钱：在来这之前，一个报道消息把我吓了一跳，说某个地方通过一个法规，规定今后语文老师上课“满堂灌”的，一堂课讲到底的，学生没有发言的，就要处罚，就是触犯法规。我觉得这些行政人员不知怎么搞的，动不动就搞法规。而这样这个评价体系都出了大问题了。

陈：现在还有一些课，非得用多媒体。多媒体之后呢，唯一的一个媒体，“主媒体”没有了。

孙：这个东西我觉得不能完全怪罪第一线的老师。因为不少第一线的老师，一方面重视文本，一方面弄一点多媒体，二者结合得比较好的，还是有的。但是，在好多地方，有一种多媒体啊，就是为多媒体而多媒体，弄了好多新花样，这个要引起注意。太多的多媒体，像钱梦龙老师讲的那样，会出意想不到的问题，包括声音不响，画面空白等。钱先生说，这哪是多媒体，是倒霉体！多媒体是文本的附属

品，但是，许多时候，文本变成了多媒体的附属品。我举个例子。我到一中学去听课，老师讲《木兰辞》，先放美国那个《花木兰》的动画片，然后放我们中国的连环画，放完后集体朗读了一番，然后就开始讨论花木兰。这就到文本了，但和前面放的《花木兰》有什么关系，他完全忘记了。他问花木兰怎么样？学生说是个英雄。什么样的英雄？女英雄。（听众笑）这花木兰什么地方英雄啊？底下想来想去，花木兰很勇敢啊，花木兰会打仗啊……只有一个学生讲：“花木兰挺爱美的。”就这样。说到花木兰回家以后，老师问了，家里反应怎么样啊？是爸爸、妈妈出来迎接她。某同学你做个样子是怎么样迎接的。就这模样迎接……（作搀扶状）（听众笑）

陈：这是“相扶将”。

孙：然后，弟弟怎么样？弟弟磨刀。某同学你做个磨刀的样子。那同学就……（作磨刀状）（听众笑）完全是机械性僵化的动作，一点欢乐的样子都没有。表演是可以的，如果是为了体会人物当时的心情，完全必要。但是这样的表演完全忘记了人物的心态，就在嘻嘻哈哈之间，文本丢掉了。多媒体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完全成为累赘。开头的多媒体表现的是美国的花木兰。本来应该提出问题：美国人理解的花木兰和我们中国经典文本里的花木兰，有什么不一样？不是说要分析吗？分析的对象就是矛盾，没有矛盾无法进入分析层次，有了矛盾，就应该揪住不放。美国花木兰是不守礼法的花木兰，经常闹出笑话的花木兰。而中国的花木兰，说她是英雄，还没有具体分析，要具体地从文本中分析出来这个英雄的特点是什么。连这样起码的问题没有提出来，结果美国的和中国的，好像是一样的，这样，多媒体就变成个“遮蔽”了。我后来给他总结说，有一个同学讲的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什么呢？“花木兰挺爱美的。”比那个“是英雄”好得多。为什么呢？它有一种“去蔽”的启示。花木兰的形象可能被英雄的概念遮蔽。英雄是什么呢？英雄就是保家卫国的，会打仗的，很勇敢的。当时我就问他，这首诗里面，写打仗一共几行？“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真正写打仗的，一共六行。可是写要出征，为父亲担心，写了不止六